

稳增长预期强化 软着陆有望实现

陈伟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了下半年经济工作重点,其中再次强调下半年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我们认为,这有利于进一步强化人们的稳增长预期,下半年经济也有望实现软着陆,而这也将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改革创新创造合适的空间和条件。

下半年稳增长将会强化

虽然李克强总理在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曾强调经济增长要保下限,宏观调控要使经济增长率不滑出下限,而随后政策层面也出台了一些稳增长的措施,如部署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等。但由于一些政策事件的扰动,人们对于下半年稳增长能否实现仍将信将疑。例如近期审计署公告将首次对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性债务进行彻底摸底和测评,考虑到地方债务的严峻性,人们不免担心审计期间,那些债务融资规模过大的地区为避免债务超标不得不暂停融资,审计结果出来之后,中央政府也很可能会相应出台后续遏制地方政府债务违规融资的政策,而这都使得地方政府短

期的新增债务融资能力也将受到限制,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基建投资增速也会受到影响。

而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一些表述表明这种忧虑过度了。在今年4月政治局的经济形势会议上,曾谈到下一阶段工作时要统筹考虑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并指出要有效防范地方政府性债务方面存在的风险,但这次会议的有关表述是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工作重点中也没有谈到地方债务问题。这都意味着这次全面审计旨在摸底和评估地方债务风险,为接下来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及解决地方合理融资提供政策依据,而不是要严打和清算地方债务的前奏。

再比如,6月钱荒事件虽然过去,但它留下的后遗症仍在7月发酵,如银行在资金运用方面更加谨慎,由此也使得金融市场利率仍处于高位,近期银行7天期回购利率在5%左右,仍明显高于今年6月前的水平,这也令人们担心下半年流动性的紧缩会明显影响经济。

而这次会议上的一些提法将有助于缓解人们的忧虑,如会议强调,宏观政策要根据经济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和微调,稳中有为,这表明目前趋紧的流动性并非下半年常态,货币政策会根据形势需要,适当地调节目前稍紧的流动性,央行近日就在公开市场重启今年

2月以来暂停的逆回购以平抑过高利率,这就是一个明显的过紧货币政策将趋缓的信号。

稳增长如何着力

日前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政策导向将有利于增强人们对于稳增长的信心,而这次会议提出的稳增长措施也有利于该目标的实现。

如本次会议提到,要积极释放有效需求,推动居民消费升级,保持合理投资增长,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这些措施虽然与一季度有相似的地方,如都强调要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培育消费新热点等,但显然比一季度的相关措施在以下方面更具有刺激经济的作用。

第一,一季度会议仅谈到要保持合理投资规模,而这次强调要保持合理投资增长,这表明中央对于下半年投资增长的下滑更加担心,下半年稳增长的关键也就要稳定投资增长,而这些投资领域包括“十二五”规划明确的前期投资进度有些滞后的重点建设任务,如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工程等。

第二,首次在经济形势会议上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积极”一词的运用表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将在下半年取得实质性进展,如中央将制定发布人们期盼已久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及相关政策,而伴随着城镇化发展路径的明确,更有利于增强城市产业、公共服务、环境及人口承载能力的

投资规划也将各地蓬勃兴起,从而也有利于地方投资增长。

第三,一季度的会议上,中央曾强调要“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但是这次强调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意味着中央对于房地产政策调控态度的转变。这一方面是因为前期房地产调控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6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数据显示,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在减少,环比下降的城市个数在增多,另一方面也表明面临现实的增长压力,中央不得不更重视房地产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无疑有利于提振地产商对于市场前景的信心,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也有望保持平稳。

尽管有以上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我们仍难以期望它们能够刺激下半年经济明显回升,毕竟中央已经明确宏观政策仅是微调,今年不会有较大的经济刺激空间,而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央还需要保持宏观经济适当偏紧的环境以倒逼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改革的推进。如下半年化解产能过剩将是中央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只有保持需求弱势的环境,才会倒逼过剩产能的退出;再如下半年的三中全会将讨论未来我国经济改革的顶层规划及部署,而只有一个中性偏紧的宏观环境才有利于倒逼利益集团主动让利,配合推进各类改革措施。

(作者单位:民族证券)

焦点评论

高校就业率存在注水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中国高校又搞鬼,就业数据狂注水。生源仰仗就业率,政绩依赖故事会。象牙塔里官得势,毕业证上谁流泪?大学精神被放逐,至今尤念蔡元培。

经济维稳将为股市注入信心

郑晓波

对于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这艘巨轮而言,在内外形势波云诡谲之时,如何把船驾“稳”尤为重要。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定调下半年经济工作思路。在1300多字新华社通稿中,有19处提到“稳”字,包括提到下半年要“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充分表明中央今年以来一以贯之的“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强调稳,乃是源于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美经济形势低迷,外需遇冷给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压力。而经过30多年的发展,国内经济各种矛盾积聚,稍有不慎即有可能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的总爆发。因此,此次政治局会议,包括以前多次国务院会议都提到要“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从而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维稳并非短期目标,而是着眼于长期;维稳也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通过锐意改革维持经济长期稳定,即所谓“稳中有为”,也就是说经济维稳的手段在于改革。两者的关系是,维稳为改革创造条件,改革为稳定打下基础,我们看到,此次政治局会议将政策目

标的表述由前期的“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防风险”调整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说明当前政府维稳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在于改革。

对于资本市场而言,经济维稳将为市场注入信心。一方面,经济维稳意味着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运行,如若经济增速超出“下限”,决策层将有一系列手段加以应对,因而市场无需过度担心经济失速。另一方面,经济维稳以改革作为后盾,未来的改革方向将通过市场化手段倒逼结构调整。在此过程中,产能过剩行业将受到抑制,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得到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的结构在此过程中有望得到优化。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也将通过改革发展为经济维稳贡献自己的力量。证监会主席肖钢日前表示,证监会将稳步推进改革创新,不断完善市场结构和功能,使资本市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众所周知,一个制度健全、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才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改革浪潮中的中国股市有望在改革中根治顽疾,全面发挥投融资功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表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依附于中国经济的中国资本市场理应也会从改革中获得红利。

帮扶小微企业要减税更要减费

井水明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今年8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并抓紧研究相关长效机制。

国务院决定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公众都从正面给予积极的评价,为超过600万户小微企业带来实惠,直接关系几千万人的就业和收入。在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压力大、成本节节攀升、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大和生存负担偏重的状况之下,免税对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的小微企业无疑是雪中送炭。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鼓励更多的小微企业坚守实业的决心,帮助小微企业有能力为员工加薪、缓解“用工荒”和劳动力成本节节上升给小微企业生存与发展来的困境,有效地促使小微企业尽快融入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的潮流中来,实现千千万万的小微企业保持良性发展。

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为超过600万户小微企业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但是,仅仅减免了增值税和营业税这两种,对于身处困境之中的小微企业是杯水车薪。现在,小微企业需要缴纳的税务,包括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流转税附加、印花税、契税等在内的二十多种税项。虽说此次国务院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可是,减免未涉及其他税项,减轻小微企业的税务负担没有真正融入到减税的众多项目,帮扶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没有动真到压得小微企业喘不过气的众多税收项目,此次减税的小微企业圈定在“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范围之内,显然这个减免税收的圈子明显是划小了。而对于那些从事制造业的小微企业基本没有符合减税条件。这种不按行业特点、企业规模大小不同的“一刀切”,实际是小微企业享受免税优惠政策的空间被压缩得非常小。

国家此次对小微企业税务负担的减免,仅仅从免税的角度,给予小微企业一

点实惠,就引来众人的热议,以为小微企业就此可以减轻负担了。但是,我们透过现象,看一看小微企业所承受的种种负担。目前,国家各部门面向小微企业的行政性收费多达69个大类,多达196种各式收费项目。有小微企业反映,如果把各种隐性、显性的行政性收费加在一起,加上二十多种税收,企业的平均税费负担高达实际收益的40%。税费负担沉重、利润空间萎缩、运营状态艰难,小微企业的负担像小学生的书包一样,过于沉重。

尽管国家和地方在税费减免上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可是,高额的税费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税费减免力度还跟不上企业成本增长的速度;减免的行政性收费名目繁多,但减免额度非常有限;企业负担中占比较大的教育附加、城建附加、水利基金等费用都没有明显减免;企业为员工缴纳的社保费(五险一金)负担明显一年重似一年,仅养老保险一项,以南京市为例,今年的缴费水平就比去年上涨了600多元。这就预示小微

企业只要多用一个工人,企业就要为其缴社保费(五险一金)多达上万元。这些力小能微的小微企业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地少用或者不用工人,把劳动成本上升额度控制到最小。这样一来,随着小微企业用工量的减少,社会劳动者就业率就会大大降低,将直截了当地危及到社会大局的稳定。小微企业吸纳劳动力就业“聚宝盆”的作用也就消耗殆尽了。

国家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只是在减轻小微企业负担上迈出了小小的一步。国家应从顶层设计上着力,建立起有利于促进小微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合理税费负担框架,研究借鉴国外经验,将小微企业征收的税种进行合并,征收统一的“简单税”。同时,在优化税收环境过程中,降低小微企业的“隐形负担”,清理政府现有的行政性收费项目,规范政府费用征收行为,推进“费改税”改革,增强企业负担的透明度,以更大的力度减轻小微企业税费负担,确保小微企业在生存与发展之中轻装前行。

■ 算法经济 | Li Bin's Column |

中国应积极介入世界粮食市场



李斌

关于粮食政策的讨论日趋激烈,而其中的混乱逻辑正在日益展露出来。反对取消耕地红线的人,所考虑的主要是粮食安全问题。例如,日前针对“金融四十人论坛”所提出的关于放弃土地红线的建议,一位社科院的农业政策专家就写下了这样的话:“中国的粮食总产量接近5.9亿吨,全球的交易额是3亿吨,如果中国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恐怕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而

如果全球出现粮食危机,各国首先要保障的必然是本国的粮食安全,限制出口。”(张晓山:《放弃土地红线吗?》,载于《时代周报》2013年7月18日;以下简称“张文”)这位作者可能说出了不少人的心里话。那么好吧,本期就来重点谈谈粮食安全问题。

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安全”意味着粮食供应在数量上要充足,在时间上要连续和稳定。我国目前的做法是:从各方面提供政策支持,最大限度地追求粮食产量,尽可能保证粮食自给自足;而18亿亩土地红线的含义是,这是确保基本口粮的底线,退到这一步,再也不能后退了。笔者认为,撇开其他方面不谈,单就确保粮食安全而言,这样的政策恰恰是十分不利的。

上述政策意味着,除非迫不得已,我们不到国际市场上去采购粮食。然而,要问的是,如果是这样目光向前,假如真有这么一天,国内发生了自然灾害,以致我们不得不大规模进口粮食的时候,国际市场上有那么多的粮食吗?张文也谈到了这一点。然而,就在某个地方,逻辑错误发生了:既然国际市场规模小,那么就要转向国内。这是许多人的想法。可是,有没有考虑过,既然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是否应当设法主动地扩张国际市场的规模呢?我们通过有意识地、连续地、有计划地采购,来引导全球种植者开垦闲置(实际上大量存在的)土地,逐年地扩大粮食生产,从而预先为我国粮食消费的增长或者其他不测事件作出准备,预留空间;这样一来,我国的粮食供应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加安全呢?

电视剧《大宅门》曾经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百草厅的主管们需要在安国药市采购大量的黄连,为此,在开市的当日,他们先以高价作出了少量采购。消息传开,各地的黄连源源不断地向安国聚集,结果,在闭市的那一天,黄连价格大跌,于是百草厅以低成本顺利地完成了全部进货。这个近代的故事告诉我们,为了保证某一种物品的供应,光躲在家里犯愁是没有用的,那是小农意识。我们要有广阔的视野,只有放眼全球,立足长远,未雨绸缪,主动出击,才能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安排妥帖。

笔者认为,我们不仅要吃外国的粮食,而且,从现在起,还要适度优先地吃进口粮。越是平时,越是没有灾难和危机的时候,我们就越要吃外国的粮食。我们不仅要向各农业大国采购,还要分散地向各大洲有特色的小国采购。我们不仅要吃外国粮,还要多存储外国粮,要树立我国进口商在外

国卖家面前的良好信誉,使外国农民放心地为我们种粮食,并为此制订长远的生产计划。这是对外汇的最为正当和有益的使用。因此而闲置下来的土地,一部分可以拿来供应城市化,一部分可以拿来恢复生态,余下来的则作为轮休耕地,以供后备之用。只有这样,当危机或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届时,如果危机是由国内因素引起的,我们则可以扩大进口;如果危机来自于外国供应者,我们则既可以选择更换外国供应商和生产国,又可以选择扩大国内种植面积。如此既可进,亦可退,这才称得上“安全”。

18亿亩红线为什么很荒谬呢?因为这个政策实际上是要把主动权交到外国人手上。它要首先把国内的生产潜力发挥得满满当当,一点儿余地不留,尽量不给国际社会“添麻烦”。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国内发生粮食危机,我们就只有仰仗外国人了;而国际市场供应不足,国内又无法扩产,我们就有可能立即陷于绝境之中,麻烦就大了。一种方法是动员别人,把余地留给自己;另一种方法是动员自己,把余地留给别人;哪种方法更安全,不是一目了然吗?

现行的政策实际上暗合着一个前提:粮食如果要出问题的话,问题将出在国际上,因此,只有优先立足于国内生产,才能安全。可是,客观地看,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粮食生产都是可能发生灾难和危机的,我们不能认为,中国农业发生歉收的可能性比外国要小。吃他国的余粮固然有风险,固然可能不那么稳定,可是,采购点多了,分散了,相互调剂余缺,供应反而会稳定下来。归根到底,全世界都给我们供应粮食,比之我们只吃自己的粮食,安全性将会大大地提高。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

本栏目在前文中已经论及,所谓“自给自足”的粮食政策,主要是在当年冷战条件下由于缺乏外汇而实行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政策。陈云先生提出的“无粮不稳”、“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的政策,主要也应当理解为针对“大跃进”时期不顾基本产业比例关系而片面追求工业化的荒唐做法而讲的,其意在强调要尊重经济规律,而不是把主观意志强加给经济现实,违背规律行事。目前实行的强行维护耕地数量和片面追求粮食产量的政策,已经让我国农业逐渐脱离了正常的成本收益核算,脱离了国际国内大市场而日益“孤岛化”。国家财政和整个经济体系每天都在为这一政策付出重大代价,而该政策却正在给我国经济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这种政策的代价变得过大以致国家不能承受的时候,或者政策制订者有一天幡然醒悟因而改弦更张的时候,由于积弊过深,国内的农业系统有可能突然发生紊乱,以致粮食生产有可能骤然萎缩。

18亿亩耕地红线还给领导和广大国民传递了这样一种错误信息:只要守住它,吃饭问题就是高枕无忧的。当真正的大灾难降临在我们头上时,我们将发现,这条红线什么也保证不了,它无法保证每个国民有基本的口粮,任何政府都没有能力使这种如意算盘变为现实;而真正有助于抵抗灾难的得力措施却会因为诸如此类的政策而遭到忽视,或者只有在灾难过后才会被想起。

对农业的补贴和粮食储备都是必要的,不过,这些措施要建立在自然的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并且要有成本核算,要将之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可是,目前的情况是,似乎很少有人认识到我国的远期粮食消费量将会在我国产量的基础上翻一番。连这样的基本认识都没有,又怎么能够谈到后续的、高端的政策设计呢?